

試論空間社會的生成機制、歷史形態與多重秩序

朱亞坤

中山大學哲學系

摘要 近代以來，人類對空間的利用和關於空間的體驗日趨複雜化，對空間的意象性認識也日益協同增強。本文嘗試以“空間社會”來概括從地理大發現以來的空間生產邏輯和空間意象的多元特性，將空間社會化和社會空間化的雙向交織運動作為空間社會生成的內在動力機制，並著重從外張式、內斂式和虛擬式這三個層面來概括空間社會演進的歷史形態，進而初步分析空間社會的身體秩序、時空秩序和美學意象，基此力圖明瞭空間轉向的重要理論意蘊。

空間研究是20世紀後半葉以來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重大研究轉向。愛德華·蘇賈（Edward W. Soja）認為20世紀最重要的知識和政治發展之一是人們開始像思考“社會性”和“歷史性”一樣來思考人類生活的“空間性”¹。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開闢了空間的政治經濟學，提出空間的三元辯證法，直言（社會）空間是一種（社會）產品²，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則強調空間不是社會的拷貝，空間就是社會³。此外，福柯、吉登斯、布迪厄、哈維等人都有對空間進行了深入探討並對後學影響至深。如火如荼的空間研究固然深化和拓展了馬克思、塗爾幹、齊美爾、年鑒學派、芝加哥學派等已有傳統的空間研究徑路，但更主要是對工業革命以來全球社會變遷所孕育著的某種新社會形態的理論嗅覺和直觀捕捉。



一 空間社會：一種可能視角

近代以來，時空關係以及關於時空關係的感知進入了一個急劇變革的歷史時期，時間的流逝和由流逝所能帶來的經驗的累積，遠遠不能比空間急劇的變化、變幻所帶來的衝擊和體驗更為深刻和不安。因為“我們可能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加意識到自己根本上是空間性的存在者”⁴。正如福柯所說“我們處在這麼一刻，其中由時間以一生發展出來的世界經驗，遠少於連接著不同點與交叉間之混亂網路所形成的世界經驗”⁵，這個世代的集體意識對空間的預料與感知、體驗和空間生成問題之間具有協同的增強的真實和想像的心理效果，從而在社會行動層面逐漸地進入到空間的內在一體化進程之中。

其實早在1903年，齊美爾就在《空間社會學》一文中指出空間是社會關係依託和憑藉點，空間作為各種獨立要素相互接觸聯合而形成有重大意義的旋轉點；⁶ 塗爾幹及其後的年鑒學派都對空間與社會行動的關係以及自然環境變化對歷史生成的影響進程做了深度剖析；芝加哥學派提出的人類生態學研究視角，注重分析城市社區的空間佈局及其與社會生活的相互影響。從20世紀中葉開始到20世紀70年代初，空間研究主要圍繞建築等實踐應用或藝術創造等方面展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亨利·列斐伏爾在《空間的生產》（1973年）一書中對空間本體論和認識論、空間的生產等作了精闢入理的分析，開闢了空間研究的元理論探求時期。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空間研究呈現出文化之維，後現代的文化傾向以及後現代主義提出的全球化空間和超真實空間成為了空間研究的熱點。比如愛德華·蘇賈提出了“第三空間”的概念，曼紐爾·卡斯特提出網絡社會和流動空間的概念，認為網絡社會是個流動社會，“流動空間乃是通



過流動而運作的共用時間之社會實踐的物質組織”⁷。此類研究都致力於捕捉人類社會變遷的空間特性，促進了人文社科研究的空間轉向，但從社會歷史生成的層面切入分析空間為什麼被突顯，以及空間與社會變遷之間所交織的複雜機制問題還為數不多，一些研究也比較集中在都市空間領域，而長期以來經濟層面的集團化、地緣政治、文明衝突、戰爭等所具有的空間意蘊及其對人們的空間體驗所產生的深度影響等方面則涉及不多。

我們認為，立足在前人空間研究的豐碩理論成果基礎上，把空間研究的觸角往歷史更深處去探詢社會行動與空間意象之間的協同增強關係，進而探索空間與社會之間關係波段的歷史形態，這對豐富我們理解人類活動的各種文化產物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也對我們理論上理解空間轉向的歷史意蘊和實踐上把握空間與社會生成衍化關係具有一定的反思意義。

因此，本文以“空間社會”概念來捕捉現代社會或後工業社會中的空間與社會的複雜關係，特別是把握社會行動和空間意象之間複合生成關係的一些特殊性，進而試圖強調空間的生成與支配邏輯作為一種社會模態與其所建構的空間話語的時代意義。之所以用“空間社會”而不是以“社會空間”來言說分析，並非咬文嚼字，而是強調在作為“抽象社會⁸”的現代社會中，空間社會具有的抽象性與歷史演進的特殊時段之間具有緊密的協合共生關係，而“社會空間”一詞只是從文化意義上突顯空間的社會性的一般意義，不足以表達出近代社會以來時空關係特別是空間與社會關係演變的特殊性。另外，需要強調說明的是，空間社會不是一種社會制度形態但又不能離開特定社會的特定形態，空間社會是以空間生成為邏輯的社會過程，也是空間意象的符號化的生產和消費過程，是以空間為分析社會的一種多維面向的意象與現實的多重結合，既可以是工具功能性的，也可以是思辨性的。它不



是簡單對應於時間社會，而是取材於時間和空間關係態下的空間處境的變遷以及空間意象的複雜，是對社會現實或者關於現實的意象的一種真實或者想像的解說。

二 生成機制：空間社會化與社會空間化⁹

空間社會何以生成？它乃是空間社會化和社會空間化的雙向交織互動而成，它具有複合性，也具有創生性。空間生成與社會生成過程直接統一，這是一體化的內在融會，同時也是內聚力的自我消解。

（一）空間社會化

空間社會化是空間自身邏輯不斷被社會滲透、解構和變形同時自身又不斷維護、發展和重組的生成過程。“空間在其本身也許是原始賜予的，但空間的組織和意義卻是在社會變化、社會轉型和社會經驗的產物。”¹⁰空間社會化的過程一直是在延續，空間意象的社會化形式不斷呈現複雜的形態和表達方式。“空間的發展過程便是社會的建構過程。”¹¹空間與社會緊密而連：空間社會化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明人類的文化化的歷史進程及其技術革命的巨大作用。

第一，空間符號化是空間社會化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形式。人們無法直接觸及空間，一方面是通過空間中的事物，並對空間中事物的定位來確定空間由虛空到實空的過程；另一方面是通過把物理空間的維度移喻到精神空間或者虛擬空間進行空間決策和採取空間行動。這些生成過程既是智慧把握世界的過程，也是世



界影響精神的過程。人類文化化的過程也是空間社會化的過程的展開：人們借助意識的觀察和實踐的進行，試圖借助圖繪，符號，聲音，形狀、姿勢，身體位移，參照事物，關係想像等來把握空間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從而進一步採取實踐行動。人們所描述和解說的空间是社會的產物，是漸積性的社會空間：通過這個空間中的各種人類符號，人們可以反觀、解讀、誤讀、重建或模糊這些符號所帶來一般和特殊的蘊涵，並根據符號的運作宣稱自己的權利，具象地說，正是通過人類符號在空間中的記錄、識別、編碼、解碼等過程，人類的空間實踐才有可能，歷史才會回歸到現實的土壤中，社會生活的可解釋性才安放在牢固的空間之基。空間符號化是人類文化創造的必然結果，也是空間實踐開展的前提條件。

第二，空間商品化是空間社會化的典型形式，是空間社會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重要特徵，也是空間社會空間生成邏輯的重要形式，空間商品化是商品拜物教下的潘朵拉的盒子。亨利·列斐伏爾思想下的空間是商品化的空間，空間成為生產資料，具有使用價值，並能夠被用創造剩餘價值，空間成為消費的對象可以被消費，成為一種工具可以成為國家統治的重要工具，成為一種歷史性社會產物也具有社會意識形態或者制度的特性：亨利·列斐伏爾認為資本主義空間是一個抽象空間，“空間作為一個整體，進入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它被利用來生產剩餘價值。”¹² 社會空間成為社會生產與再生產的重要部分，那麼資本主義條件下空間生產的邏輯與策略是什麼？“以生產之社會關係的再生產為取向，空間的生產發動了均質化（homogeneity）的邏輯與重複策略（strategy of the repetitive）。”¹³ 資本主義通過經濟層面的均質化和政治層面的無礙化實現了商業化空間和員警空間的耦合，消弭了空間的差異化。而社會主義空間將會是一個差異的



空間，“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將世界‘翻轉過來’意味著顛覆支配性空間，將取用置於支配之上，將需要置於命令之上，將使用置於交換之上。”¹⁴ 從而實現社會空間的集體佔有和集體管理。我們因此不難看到，空間商品化具有其歷史特殊性，是空間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出現的一種特殊的空間特性，但它不是抽象於歷史生成，而是通過具體化的空間商品化的細節來實現。

（二）社會空間化

社會空間化是社會組織化過程與群體階層化、個體社會化之間的聯繫以有形的或無形的空間分類形式（分隔、排斥、異化、同化等）來表達和約制的生成過程。這一生成過程交織著從模糊性的空間區分意識到明晰性的階層身份標示的空間意象，產生空間分區，也產生在精神空間領域如公共領域的文化共同體的形成、特殊話語體系的集中以及專業技術工具的合成和使用，還相應出現各種文化象徵符號來進一步鞏固和延續空間表徵過程。空間的多重形式一方面固然有著自身物理特性的限定（這些限定越來越人工化，限定作用越來越衰微），其折射出社會組織過程的複雜性和個體社會化實踐的多樣性。

首先，社會空間化交織著多元的意念機制。是人類的活動能力和活動過程與物質性空間相互作用，進而運作而產生各種新的空間形式，同時反過來影響著人類文化心理多種意念機制的生成。空間作為物質基礎型塑人類生活及其生存心態。空間具有一種力的作用風格，是由人的活動與物質性空間相互結合運作而產生的各種新的空間建構所具有的力量。具體的一些空間形態和機制關係如表1：

表1 空間形式與意念機制形式¹⁵



空間形式	意念機制形式
社會關係空間	脈絡化的意念機制
認知空間	類比的意念機制
象徵空間	隱喻和換喻
意識形態空間	階序化機制
文化習慣空間	身體納入機制
……	……

不同的空間建構形式有著不同運作過程的意念機制形式：社會關係空間藉以脈絡化的意念機制來界定、限制、及調節人或群體之間的關係；認知空間有類比化的機制來構成、限制、及調節各種物質空間；象徵空間有隱喻及換喻來界定、限制、及調節物質空間的象徵意義；意識形態空間有階序化機制來界定、限制、及調節空間之間或主體之間的平等與不平等關係；文化習慣空間則有將身體納入的機制來界定、限制及調節不同的空間趨向等¹⁶。空間的形式紛繁複雜，相應的心理意念機制也是複雜多樣，社會空間化的過程依賴於空間形式與心理機制的雙向互動，不同空間形式受到的處置方式是不盡相同的，貫穿在不同空間形式之間存在著某種微觀滲透的力量或者說不同空間形式之間的跨越不但存在意念機制互相通約的可能，而且事實層面也使得種種互文式的滲透更加現實化和複雜化。

其次，社會空間化呈現出總體性的社會網路模態。從社會的系統性或者是說社會的網路化來看，處於一定關係網絡內的各關聯部分之間的複雜聯結與社會空間的結構分佈之間有一定的相似性，把握這個社會空間分佈所折射出的階層體系結構，進而理解社會空間化的廣度和深度。遵循著關係性的思維或者雙向建構的思想，視“社會空間便是一個包含有不同資本總量和資本結構



所決定的各種位置的多元空間”¹⁷，同時“在觀察社會空間的時候，首先必須看到建構這些社會空間的區分化原則，把這些原則當成為觀察社會空間的基礎”¹⁸，布迪厄通過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等資本總量分佈和結構分佈，透視社會各種場域中的社會行動者的文化品位、生存心態等區隔和階層化現象，並不斷進行著社會的再生產。這樣社會空間化為各種場域，這些場域不斷進行著資本和權力的角逐，場域的再生產不斷締造著新的社會空間。

第三，社會空間化表徵於具體的場域。在吉登斯看來，場所可以是屋子裏的一個房間、一個街角、工廠的一個車間、集鎮和城市，乃至由各個民族——國家所佔據的有嚴格疆域分界的區域。其典型特徵就是內部區域化，不但是空間的局部化，而且是包括了各種例行化社會實踐的時空分區。¹⁹ 這些例行化社會實踐如住宅內不同房間、樓層的社會活動（睡眠、生活等）的分區，這些分區與時間組織方式的分區性緊密相關。而福柯眼中的當代社會更直接是空間化的社會：空間成為社會系統鐵籠的物化指稱：現代性條件下的空間是一個因循其微觀物體特性而設成的密閉式的監獄群島，也不啻為古拉格群島的現代版，“現代社會就是一種空間化的社會，是一個規訓性空間並置的社會，是通過空間來統治和管制的社會。”²⁰ 權力像是一種流變，流淌在現代空間的每個角落，滲透進現代社會的每一個毛孔。

（三）空間社會化與社會空間化的辯證關係

空間社會化與社會空間化一直以來的雙向運動生成了多元後果，而這些後果又重新成為結構化²¹ 進程和非結構化生成過程。空間社會化一方面受到空間物理特性以及物理特性在觀念形態的基質力量的影響，另一方面受到人的社會實踐水準、人主體自身內在有限性的限制，顯示出了空間社會化的歷史形式的多樣性：



是人詩意棲居之所和委身安命之處，也是人精神遨遊之洋和藝術描繪之材；是物寄放形骸之所和變遷演化之地，也是物有形無形之幻和生成消逝之依；更是事態滋生發展之場和多維多向表達之方，也是事件交織人、物，空間連接社會的動態結合之力。社會空間化深深根植於社會組織過程和偶然性變遷，依託並受制於身體運作、感官感觸、社會化和文明化進程、技術進步、器物變革、權利訴求、權力施行等，同時造就了不平等的分化和極化，也形成了空間正義的烏托邦。

空間社會是一個佈局式：多種形式存在的空間是以複雜的交融的形式構成了空間社會的多重面向，多種社會力量的混合作用協同宰製和分割著空間，空間社會化和社會空間化是辨證的過程，兩者之間不是相互隔離而是相互滲透的雙重互向過程，可移喻為一個硬幣的兩面，兩者分開討論，一方面是為了在空間與社會之間的關聯中離析出他們結合的巨大意義和可能的途徑，另一方面是為了定位空間社會形成於空間社會化與社會空間化交接的關鍵之處：這也是為了空間社會做一深刻的理論辯識：任何一個社會都有空間，任何一處空間在人的實踐活動下，都有可能被社會化，但僅有這些是不足以稱謂所謂的空間社會的誕生：空間社會只有在整體或者部分空間內在性充實關聯、人群空間體驗起協同增強條件下才有可能被完全指稱。

三 空間社會的三種歷史形態

空間社會的指稱是歷史性的，既與主體性的發展歷程與深度重組相關，也與對象性活動的技術發明與應用的水準相關。它至少包含有外張式、內斂式和虛擬式三種歷史形態。這三種形態之間不具有平行性也不具有同等性，三者只是我們把握空間社



會可能的歷史脈絡之三種偶然，他們不但在歷史性存有差異，更在於社會內容層面的影響力以及對空間體驗、個體社會化實踐、國家或地區的社會實踐等方面的不同表徵和滲透之中。

（一）外張式

簡略而言，在地理大發現²²之前，關於空間整體性認識大都處於抽象思辨或者想像描繪的階段，托勒密的《地理學指南》被湮沒了1000多年後被譯為拉丁文時，大地球形說才漸漸地廣泛傳播開來，而所謂的“文明民族”和未開化民族之間互不為知，文化因地域阻隔，互為通約在想像和實際層次上都十分蹇促。自15世紀中後葉至17世紀末葉的地理大發現以來，歐洲通往印度新航路的開闢（1473年-1498年），美洲新大陸的發現（1492年-1504年）以及各種洲島、海域、航線的發現或者開闢，使得人們從實際層面感受到了世界的整體性，關於世界地理的認識產生了飛躍式的變革，“地理大發現改變了人類的空間關係，也改變了人類對世界的認識。”²³ 空間社會的意識也是在這種變革過程中誕生和滋長：社會形態遭遇到地域空間的分割和差異化，而各種文化在地域上的差異引起了空間意識進入文化的深層地帶，文明與野蠻一定程度上表現為地理空間的文化歧視和不平衡的空間表徵。空間主義成為欲望彰顯，生活世界場所化和階層化，甚至文明化的標杆。

18世紀晚期在西歐開始的工業革命拉開了空間社會的構造。工業革命由英國開始，逐漸擴散到整個歐洲大陸，19世紀波及北美地區。機器生產把身體引向了單向度的發展模式，大規模工廠的建造成為商品積聚生產的場所，空間極化效應成為了空間社會的原始形態，工業化伴生著城市化，人口大規模地方方向性遷移（遷移到城市和發達國家），資本主義以商品生產和銷售的空間擴



張，通過鐵路築建和運輸以及通過汽船把資本主義輸送到世界各國家和地區。空間性質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空間被納入到了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之內，一方面，內聚於資本主義生產鏈之中；另一方面，外張於地域的殖民過程。文化上的浪漫主義也被急劇流變的社會節奏所沖潰，主體性迷失在人的異化這一主題的悲哀之中。空間社會成為了現代性多重面向之一。

1846年到1847年出現了經濟大蕭條，1848年及往後的革命浪潮風起雲湧之勢，造成了一種表達上的危機，這一危機導源於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時間和空間意義方面的一種根本性的重新調整²⁴。經濟危機與表達上的危機，既是資本主義流弊的暴露，也是人們如何審視和反思現代社會的新總結的開始。一個什麼樣的空間社會在價值和道德層面的模態成為了那個時代的社會訴求之一，但這一訴求只能在藝術中找到影子，遭受到了文學，繪畫等藝術的深刻追問。生產的主軸經過資本主義自身的技術和組織形式調整而繼續擴張，而且變得更加瘋狂，殖民已經變成全面和徹底的掠奪與瓜分，帝國主義得意洋洋於通過各種手段征服空間。到19世紀末，整個世界已基本上被瓜分完畢。1900年時，非洲90.4%的領土，亞洲56.6%的領土，美洲27.2%的領土，以及大洋洲的全部，都淪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與此同時，還有許多國家和地區，如拉丁美洲各國和亞洲的中國，伊朗和土耳其等，都被納入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不同程度地淪為半殖民地和附屬國。²⁵

至此空間社會的外張式模態傳統而又宿命式地形成了，被絕非純粹是生產關係的資本主義體制所貫通，交織於戰爭，更加動亂，侵略和反抗不斷演繹時代的悲劇；滲透於經濟和文化，動盪不安、彷徨無定成了基調的音符；掌控於政治，傳統的解構，一如無奈的夢魘。全球性的社會關聯，痛苦呻吟者要比歡呼雀躍者眾。空間所得到的注解，複雜得無從理路。空間被征服，被控



制，被裹挾，被蒙蔽，被誘引，被充斥，被中心化和邊緣化。這已不僅僅是現代權力對傳統革命式的顛覆和商品經濟全球化的海嘯，還是社會組織過程的多向關聯和社會關係的深度重組，更是人類對時空神話在實踐和生活領域內的解魅。還有什麼比這個時候的生存和利益更為引人注目呢？還有什麼能夠比抵制侵入和重建完整自身更為迫在眉睫？又還有什麼能夠比混亂、無奈，比節奏化宿命更為真實呢？

（二）內斂式

從20世紀一十年代初逐漸開始，空間社會的內斂式模態開啟了自身無目的地的航程。

1914年開始的福特主義（Fordism），奉承企業化的運營方式，大規模工廠的建立，流水線生產模式的迅速鋪開，泰勒的科學管理理念的踐行，使得空間作為有效的生產要素，進入到生產的準備和過程之中。空間不但受到資本式的同化利用，也受到集權式的異化統治。（1936年凱恩斯主義的推行）福特主義進一步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全球化國際性擴張（儘管1929年的經濟危機透射了資本主義關於空間中商品生產、空間中的人群社會內的權力鬥爭）。到20世紀70年代初，與福特主義對抗的一種新的靈活積累的出現，依靠同勞動過程、勞動力市場、產品和消費模式有關的靈活性²⁶。空間社會在經濟層面的生產模式內部呈現出內聚的特色，不僅如此，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經濟區域化、集團化趨勢的加劇與經濟的全球化共同形構了當代空間社會的宏大經濟敘事：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和亞太經合組織三大地區性的經濟聯合體及其三者之間的關係對於當代世界的經濟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從空間的角度上看，當代空間社會經濟層面的區域化以及為維護區域化採取的經濟策略，可以歸結為空間控制的技術策略，經濟區域化是空間社會力量之間對抗所採取的空間政治。經濟力量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分割著世界、分化著世界經濟的水準。如果這類經濟式的空間調節顯得溫和，那麼作為政治延伸的戰爭更是空間社會的破壞者和重建者，也可能是終結者。人類20世紀以前從未有過而在20世紀發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席捲了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不同程度上影響了各國的發展和世界地理版圖的重新分界。今天，全球範圍的世界大戰被戰爭手段的無限性所遏止，但地區性的軍事衝突此起彼伏：阿以衝突、印巴之爭、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英阿戰爭、朝鮮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空間社會的地區性動盪一直存在著，也是空間社會發展的不確定性一直在增長著。一定程度上說，戰爭是空間的政治調節，也是空間的身體調節，在戰爭手段無限性的今天，戰爭遠離了冷兵器時代、遠離了戰爭手段的有限性時代的空間限度，空間擴張的本性在擴張中受到自我的抑制，在實現中隱藏了巨大的顛覆力量，空間成為一個非死非生的命題，空間社會的今天，也不是普通戰爭的時代，而是戰爭的戰爭的年代，世界格局在不斷形成也在動盪中成型。

塞繆爾·亨廷頓認為，冷戰後的世界，衝突的基本根源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衝突”。我們可以說是地域文明的跨空間衝突、或者文明內在精神價值的全球化衝突。在他看來，世界格局的決定因素表現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還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這些文明以地域命名，形成於傳統的空間差異上，這些文明差異的相互衝突也不再是局限於地域性上，而是在全球範圍內：任何一種衝突都反映在世界層次上，任何一種文明也在全球範圍內繼續演進著。地域



文明，及其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無論何種形式，都標示著當代空間社會的文明內涵。

如果說空間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層面的顯示依然擺脫不了傳統社會理論的學科分立的視野局限，那麼即便遵循當代空間理論的研究焦點：晚期資本主義國家干預的加強、城市發展的空間規劃、後現代大都市的發展或崛起，都市社會空間的發展、地區的空間分佈和具體區域內的空間功能分佈等現象，我們更可以坦誠空間社會的內斂式模態早已形成。

在艾倫·史考特看來，“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印記，乃是國家廣泛地經歷著生產與再生產關係。”²⁷ 國家干預在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成為必要以便進一步發展之需，“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家已經投注了大量和持續迅增的公共資金到區域發展方案、高速公路規劃和建造、新鎮的闢建、公共住宅方案，以及許多其他投資領域。這使得都市和區域課題愈來愈被人重視，並且連結形成一個由分析、科學和政策各層面的論述合成的偶然體系，作為有限的政治行動的依據。”²⁸ 關於城市規劃、空間功能性分佈等方面的理論性探討和經驗性研究逐漸成為了社會研究的焦點。空間問題被突顯出來實際上是空間社會在城市化社會生活中的問題意識突顯，空間體驗經由反思構建了人們思考的基點。世界的地表不再享有地區性的平靜，而是各地區的經濟、政治、文化的緊密聯繫成為空間社會的活力場面。

(三) 虛擬式

自第二次工業革命以來，技術的發明和應用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日常生活，電力方面的發電機、電燈、電車、電影放映機，動力方面的電動機和內燃機，交通方面的汽車、內燃機車、遠洋輪船和飛機，以及通訊方面的電話和無線電報的發明和應用，以



前所未有的歷史推動力深刻重組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內容、方式並影響其態度，人們的時間和空間觀念及體驗也進入了深度的歷史變革中。空間社會的外張式模態和內斂式模態也得到了強化，技術使得空間的符號化呈現更為複雜，空間障礙的克服不斷簡易，空間關係卻趨於逐步緊張之中，空間的背景性地位似乎得到了拋棄，直接地參與被改造與被體驗當中。而20世紀四五十年代開始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尤其是原子能技術、航太技術、電子電腦等的發明創造和應用，更是開闢了空間技術史的新紀元：航太技術使得人類的探知和行動能力進入了外空間，原子能技術能夠把空間的歷史和社會表現瞬間化為烏有以致主體性遭到徹底的迷失；電子電腦的推廣使用和技術的更新換代，並進而滲透到人們的私人領域、交際領域、家庭領域、社會運作系統和世界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空間社會的面貌千姿百態，亦真亦幻，具有蒙太奇效應，確切又是真實性的歷史效果。空間社會既具有真實的動態演繹，同時又具有超真實的虛擬的變遷動力和呈現方式。虛擬式模態成為空間社會的可能模態之一，空間社會的虛擬式模態不像外張式模態和內斂式模態那樣具有外在的可感知性以及事物指稱的具體性。虛擬式模態意味著虛擬本身就是一種迥然不同的現實，這個現實首先是空間性的滲透和符號化，也是空間體驗的移喻化過程，其次也是主體的人的多重轉變及其抽離後的深度後果：空間社會的虛擬模態下人的社會行動，地域感逐漸喪失，依託於符號和技術工具，立足於想像的各種空間。

空間社會的模態表明了從形態學和力學效果上把握空間社會複雜性的一種理路。多維動態、多向互合的現實或想像的糾結，要遠比概括性的描述更加具象和豐富。外張式、內斂式和虛擬式，試圖表明的是空間社會在形態呈現的可能意向，這些意向深深根植於日常生活實踐，也受制於宏大的經濟、政治和戰爭、文化等敘事序列的交叉之中。



四 空間社會的多重秩序

空間社會的複雜性在於它運作和呈現的複雜性。它有著一系列複雜多樣的機制運作、秩序循行和符號編碼。傳統空間社會成型以降，各種機制和秩序也是在不斷成型、變化、解構和重構過程之中，空間社會是作為一個過程而存在，過程的變動不居並不是空間本身在不斷變化，恰恰是體現空間的無形或有形的各種機制——秩序的變遷使然。空間乃是一種秩序——既是一種客觀的秩序，也是一種主觀的秩序。²⁹

（一）空間社會的身體和身體秩序

人類的社會實踐活動和意念體制的發展首先是從自己的身體空間開始，並以自己的身體為空間化意念的基準，對自己身體部分的空間語言性定位以及進行身體的空間位移。對於外在世界及事物的審視，人類自身遵行的是擬人說（anthropomorphism）的視角和體驗方式，擬人說是“人類（對世界）的一種最根本的反應方式，他是人類在構建其自身、構建其世俗組織及神祇系譜過程中的一種創造性力量。”³⁰ 即通過身體來把握外在，同時外在事物或者過程也受到身體空間化的區分。理查·桑內特（Richard Sennett）概括了“聲音和眼睛的力量”，“心臟的運動”和“動脈與靜脈”三種身體形象³¹，通過相應的身體行為影響著城市空間規劃和結構設計過程，體現身體組織空間的動力學意義。

在空間社會條件下，身體及身體秩序顯示了自身的內在複雜性和過程特殊性。身體被商品化：身體被奴役和暴虐，成為標價的商品出售和任意處置（典型體現是奴隸貿易），勞動力與生存資料互相交換而進入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當中；身體被規訓化，權力的侵蝕，使得個體的身體按照國家身體的理性籌畫而



改變自身的存在狀態；身體被赤裸化，生命淪為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赤裸生命”（bare life），演繹出戰爭的殘暴、大屠殺的獸行和原子化的政治犧牲品；身體被消費，成為也只是成為欲望的彰顯，也成為德勒茲筆下欲望的生產性機器；身體被虛擬化，年齡、性別、種族等被掩蓋在虛擬模態下，單一的片面的身體在交往過程中被性格式化了。身體的複雜性透視空間社會的身體秩序的複雜性，正如亨利·列斐伏爾所言：“整個（社會）空間都從身體開始，不管它是如何將身體變形以至於徹底忘記了身體，也不管它是如何與身體徹底決裂以至於要消滅身體。只有立足於最接近我們的秩序——即身體秩序，才能對遙遠的秩序（國家的？全球的？）的起源問題做出解釋。從空間觀念看，在身體內部，感覺（從嗅覺到視覺，它們在不同的領域被區別對待）所構造的一個又一個層次預示了社會空間的層次和相互關係，被動的身體（感覺）和能動的身體（勞動）在空間裏聚合。”³² 身體的秩序始終在身體的被動和主動之間顯示出改變現實的張力機制，一方面既形成在空間社會的環境之下，另一方面也主動地參與空間社會的實踐之中：身體的空間體驗隨著這種張力機制而發生並導引自身的行為實踐。

（二）空間社會的時空機制

時間和空間是社會經緯，也是社會行為定位的坐標系，“時間就其本身而言是荒誕的；空間本身也是這樣。相對性和絕對性相互映射，每一方都常常依賴於另一方；空間和時間亦復如此。”³³ 但是不同社會中的時空關係是不一樣的，社會時空結構的支配性邏輯和相應的時空體驗也是不一樣的，因此社會的時空機制也隨之迥異。“時間和空間的客觀概念必定是通過服務於社會生產再生產的物質實踐活動與過程而創造出來的。”³⁴ 空間社會



形態下的時空機制不僅受到特定生產方式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影響，同時也受到時間和空間的客觀屬性、特定社會文化背景、主體屬性結構及其相應的時空體驗的影響，充滿了細緻的微妙性和高度的複雜性：空間社會的時空機制是以無空間之空間、無時間之時間和無時空之時空為流動型的機制模式。

曼紐爾·卡斯特認為，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裏，一直是時間塑造了空間，“流變（becoming）建構了存在（being），時間馴服了空間。”³⁵ 時間是社會主題歷史化的憑依，存在的多樣性是在時間海中不斷滋育而成。就社會物質生產與消費等方面而言，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通過時間消滅空間實現資本運營有過經典的論述，“資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毀交往即交換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個地球作為它的市場，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時間去消滅空間，就是說，把商品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所花費的時間減到最低限度。資本越發展，從而資本藉以流通的市場，構成資本流通空間道路的市場越擴大，資本同時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間上更加擴大市場，力求用時間去更多地消滅空間”³⁶。同時，通過時間消滅空間，已經徹底改變了進入日常再生產的商品的混合。人們的消費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如鮑德里亞所言的物的豐盛的社會，琳琅滿目、應有盡有成了空間消費的隱喻，人們在有限的幾個地方，享受盡了空間跨越的瘋狂，不但是時間消滅了空間，“形成”成為可能。而且空間也轉換了時間，使“存在”成為可能，形成了一個無空間之空間的態勢。³⁷ 時空壓縮構成了現代社會與後現代歷史狀況的肖畫像。“我們社會裏的支配性趨勢則展現了空間的歷史性復仇，亦即根據空間的動態，而以不同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邏輯來建構時間性。”³⁸ 流動經濟下的網路社會中的流動空間使得時間成了“無時間之時間”（timeless time），“我認為無時間之時間（這是我為我們社會的支配性時間所命之名）產生於當某個既定脈絡——亦即資訊化範式和網路社



會——的特徵，導致在該脈絡裏運作之現象的序列秩序發生系統性擾亂之時。”³⁹ 無時間之時間，形成了新的時間體驗，這是在空間逐步被抽離，空間具體的物理地理特性逐漸被解構的情況下發生的，時間本身的客觀特性不斷細微化以至形成於傳統時間觀念下的感官很難感受到時間形式的新變化，人們的時空體驗面臨著危機和深度重組的可能。

通過時間消滅空間，形成無空間之空間，表明空間社會的內聚力不斷加強，空間上各部分的關聯逐漸緊密；通過空間轉換時間，形成了無時間之時間，進一步體現了空間社會的內部關係的協同增強，同時開闢了超空間虛擬仿像運動的必然，空間和時間被廢除了，形成了無時空之時空：模擬的現實，仿像的超現實，締造了一個依靠符號進行對象性活動的地球村，麥克盧漢感歎若是：在擴張了3000年後，依靠分裂的手段和機械技術，西方世界正在內聚。在機器時代期間，我們已經把自己的身體延伸到了空間。今天，在一個多世紀的電子技術之後，我們已經把自己的中樞神經系統本身延伸到了全球的環抱之中，就我們這個星球所關注的而言，我們已經廢除了空間和時間。⁴⁰

時空被廢除，變成了無時空之時空：一切事物都瞬息萬變，又彙聚如一。這種新時空的景象，以前所未有的衝擊力改變著人們的時空體驗，主體最根本的時空定位模糊了，遺失了，迷失了，卻仍然掙扎著重新歸位到模擬的實在象中。空間社會的虛擬式模態展露出了魔力般的與眾不同的風格。

（三）空間社會的美學意象

空間社會的美學意象試圖在空間生產的經濟理性層面和人的審美生存之間確立一種和諧的存在象，有如福柯式的審美生存或者齊美爾的社會感覺學（社會審美學）。科學主義和貨幣商品深



刻影響了空間社會的美學意象。“在美學上，科學主義把人的美感等同於快感，而且認為美感是必然的、普遍的，或者說與快感是同一的。”⁴¹ 科學主義所形成的工具程式留給美學意象的只是實用的殘餘或者廢棄的垃圾，貨幣商品一直權衡著空間的使用價值，貨幣在充當科學主義幫手的同時還不忘假惺惺的美學兜售：身體可以被塑造，空間可以被有限美化，人們可以詩意地棲居在錢屋中。非理性、非實用、歷史迴圈、審美感覺構成了與“資產階級文明的現代性”相抗衡的“審美的現代性”的主要內容⁴²。

距離化是空間規劃和管轄的重要策略，對不同功能或者不同空間位置進行距離化的編排，既可以是高度的經濟理性籌畫，也可以是把理性功用和審美情趣互為協調的訴求。城市公共活動空間的編排、商務與住宅的距離、商業場所內部的設計、娛樂休閒空間等建築或擺設，都以一定的距離化為基準。同時空間的距離化也深深影響著現代人的內心情感和抽象能力、人際關係等，“在某種程度之內空間的距離提高著藉以克服它的抽象的能力，然而在這個階段之外，恰恰會令這種能力癱瘓。”⁴³ 心理主義成了社會審美學的方法之一。

隨著自然空間逐漸被社會空間所取代（這也是列斐伏爾關於社會空間是社會產品的意涵之一），社會空間在生產過程中，其中一定程度上的重新自然化（模擬自然）成為了空間生產或者空間裝飾的重要一部分。在枯燥或者缺乏人情味的空間表面中設計或安置一些自然化的裝飾物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當前社會條件下人們貧弱的審美意識。

身體化是空間社會審美意象的重要一面，身體空間的設置與改變、服飾佈局的講求、顏色部分的選配、感官欲望的滿足，遵行的是快適原則：視覺的暫時性快感的獲取，性快感的一時之樂，內在虛榮心的外露等。擴而言之，權力的紀律形式對身體的規訓，使身體遵循微觀物理的政治美學，身體美感的意向重新編



排，使身體接受醫學美療，身體化的美學進程被宣示被展示，同時也暗含著無所不在的風險。

空間社會的蒙太奇效果使得集成化成為另外一種現實的虛擬化追逐。電子電腦呈現出的世界使得空間社會的美學接受了集成化作為一種介面的美學效果重新進入人們的審美進程：人們在無時空之時空中體味夢幻般的混淆真實和想像的仿象，視覺上的衝擊不斷重新改變心理上的空間想像和社會行為，一種模擬化的美學主體和客體的出現，只能以康德的審美能力的綜合來驅除二元對立的審美幻象。

空間正義作為空間社會可能的本真性美學意象，是與主體的歷史性地位緊密相關。正義不但是個價值或理念的追求，而且是關於空間實踐的規範化要求，同時涉及了空間表徵和其他空間意向的合理性，是理性和感性的高度統合，是實踐和意向的同一化過程。

五 總結與討論

空間社會本身就是一個開放性的命題，空間社會概念提出和分析，是為了從社會形態層次上進行空間的度量和把握自地理大發現以來的人類社會急劇變遷的某個維度，通過空間社會化和社會空間化的兩大原生性動力分析空間社會的生成過程，主要是為了解析空間和社會之間自雙向生成以來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繫以及這些聯繫的不斷發展過程；空間社會的外張式、內斂式和虛擬式歷史形態的初步概括和歷史進程分析，並不是簡單地對空間社會作進一步的形態區分，而是試圖對空間社會的複雜性做一嘗試性的梳理。



需要指出的是，關於空間社會的多重歷史模態和各種機制秩序的思想基點是有限性：有限性既可以作為一個消極的阻隔，也可以作為積極的界限，更可以作為視角內在性的基底。早期海德格爾認為存在本身本質上是有限的，此在的有限性更為根本⁴⁴。空間社會的有限性體現在物理或地理環境的固定性、社會行動者的生命軌跡和活動水準以及空間意象上。

在資本主義組織社會生活歷程當中，D. 哈維認為，都市建成環境本身的固定性，又為持續的資本主義積累創造了問題，因為它受困於特殊的空間位置投資，而這些投資在一段時間後尤其是在危機期間，可能不再如他們過去一樣有效(和有利可圖)。已建的形式在不再滿足直接需要時自由圍繞物理地形移動的不可能性，為資本和資本主義城市空間的社會結構造成了一個永遠兩難的境地。因此資本主義必須總在它具體的地理創造和破壞之間達到一個不穩定平衡，走一條在危機和重構時期變得最成問題的微妙道路。為此，他提出了空間修補 (spatial fix) 概念，以描述資本在回應危機時如何來認知自己具體的都市和區域地理，並為積累開闢新的空間。⁴⁵ 空間修補行為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已建環境和進一步積累之間可能存有的矛盾，而事實上這一矛盾是與生俱來的，在建設作為一種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行為過程時的規劃來獲取利潤、以及在空間修補作為一種最低減損行為之間的本質是共通的。不僅僅在環境上，而且在技術上，修補必定成為有限性的反面存在。

從社會行動者的角度來看，社會行動者是生物行動者、文化行動者和社會能動者的三位一體⁴⁶。就生物存在而言，受到自身生物性欲求的限制；作為文化的濡者，既定的價值體系成為他行動的意圖背景；作為社會存在，社會組織和制度化尤其是其社會化層次的影響。我們說人一定程度上是被動的，但這種被動的意



義可以是多元化的結果；同時也不否定在結構化過程或非結構化過程中人的主動地位，但有限性仍然是主動的深層約制。

在吉登斯看來，時空維度這一脈絡相連地存在於活生生的行動本身之中。他在《社會的構成》一書曾批判性引用了赫格斯特蘭德的時間地理學所表達的有限性思想：“(1)人的身體具有一種不可分性……肉體存在 (corporeality) 對人類行動者的運動能力和知覺能力都強加了嚴格的限制。(2)人類行動者所度過的一生是一種‘向死而生’，具有一種有限性……(3)人在同時參與完成一項以上的任務方面的能力是受到限制的。……(4)事實上，在空間中進行的運動也是在時間中的運動。(5)時空的‘容納能力’是有限的。沒有兩個人體能夠同時佔據同一空間；物質物件也具有同樣的性質。……”⁴⁷ 赫格斯特蘭德提到的這些方面的“時間地理現實”(timegeographic reality)作為一種有限性的社會或生理現實，直接切入日常生活的軌跡和例行化實踐當中：這些有限性的現實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社會行動者的行動的範圍和邊界，甚至影響著行動者的環境背景的延伸以及行動意圖的確立。社會行動者的日常生活實踐會受到能力制約(capacity constraints)和結合制約(coupling constraints)。因而行動者常常碰到的是未預期的後果，總是存在著行動意圖與行動後果之間某種程度的妥協。⁴⁸

那麼技術進步消除了這些制約了嗎？時空壓縮條件下的行動者的技術憑藉和身體觸及以前所未有的活動能力是否擺脫了這些有限性？如果以身體/主體為圓心，以人的活動能力為圓半徑，其所形成的圓周大小可以表示一個人的活動能力和涉及的範圍的大小，而圓周上的與外界接觸的區域表示有限性，那麼圓周內範圍越大，圓周長就越大，有限性以新的某種方式進入了行動當中：技術進步給人帶來自由的同時，使得人們享受這些自由帶有更多的監視性和虛擬性：人們享受的是自由的形式，而不是自由帶來



的快樂。現代性的焦慮如影隨形，桃花源式的生活只能是夢中之幻，風險意識與本體性安全受到的危險一樣與日俱增。

試圖把有限性作為分析空間社會的限面，主要是為空間社會視角的反思確立一個阿基米德支點：有限性既作為空間社會體察自身發展宏大敘事的警覺性反觀，同時又作為空間社會具象化現實的展開和回歸開闢可能。有限性的植入，可以說是社會分析的主觀性的影響，也可以說是分析主觀性的客觀朝向。空間社會的限面不斷納入分析的路徑，就是不斷把視角朝著空間社會的變化的可能。只有秉承有限性的切入，這一視角才可能獲得一定程度的豐富。

空間社會作為一個現代性語詞試圖去描繪並強調社會歷史的動態化變遷及其後現代意涵，還有多重面向值得進一步關注，對包括外空間（太空）群體體驗和進入條件、界限空間等空間形式的多樣性和空間體驗背後的文化傾向、社會背景、空間學教育、權力分割、研究者或群體的地域分佈等因素的綜合考察，將有助於我們對空間社會的進一步研究。

正如吉登斯所說的那樣“不在於沒有一個穩定的社會世界讓我們去認識，而在於對這個世界的認識本身，就存在著不穩定性和多變性”⁴⁹，我們在觀察和描繪周圍世界時難免會採取不正確的方法⁵⁰這一表現上的危機一直都存在並發揮著作用。空間社會為時代思考提供了本體論或基礎性的構件，即我們都是空間性的存在，這多少有點被動的歷史宿命不曾使我們迷茫於空間的變幻，但無疑不能抵禦有限性的侵入。

注釋

- 1 Edward W. Soja,《第三空間——去往洛杉磯和其他真實的和想象地方的旅行》，陸揚等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2。



- 2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 — Smith (Oxford: Blackwell Ltd., 1991), 26.
- 3 曼紐爾·卡斯特, 《網絡社會的崛起》, 夏鑄九、王志弘等譯(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6), 383。
- 4 Edward W. Soja, 《後大都市——城市和區域的批判性研究》, 李鈞等譯(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 7。
- 5 米歇·傅寇, 〈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脈絡)〉, 陳志梧譯, 載於《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 夏鑄九、王志弘編譯(台北: 明文書局, 1994), 400。米歇·傅寇是台灣學界對 Michel Foucault 的翻譯。中國大陸學界一般將 Michel Foucault 翻譯成米歇爾·福柯。
- 6 齊美爾, 《社會是如何可能的: 齊美爾社會學文選》, 林榮遠編譯(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2), 290-316。
- 7 曼紐爾·卡斯特, 《網絡社會的崛起》, 夏鑄九、王志弘等譯(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6), 383-384。
- 8 李猛認為, 抽象社會的問題來自現代人的生活經驗。現代人把社會好像變成了一個抽象的對象, 需要不斷加以考察、研究、反思和轉變。抽象社會實際上涉及了現代社會程序性、反思性和非人格化三個特征。參見李猛: 《論抽象社會》, 載於《社會學研究》第一期(1999), 1-2。
- 9 “空間社會化”和“社會空間化”兩個術語的使用得益於台灣一些大學開設“空間與社會”這門研究空間與社會關係的課程: 把“社會化空間”和“空間化社會”作為思考的兩個面向; 同時得益於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於海教授在《社會空間概念辨析》一文中用“空間的社會性和社會的空間性”的辨證存在來概括列斐伏爾關於社會空間本體論思想。本文之所以提出使用“空間社會化”和“社會空間化”兩個術語, 原因是認為空間化和社會化之間的動態化聯結關係, 但這種聯結是複雜而且不均衡的過程。
- 10 Edward W. Soja, 《後現代地理學》, 王文斌譯(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4), 121。
- 11 黃應貴, 〈導論——空間、力與社會〉, 載於《空間、力與社會》, 黃應貴編(台北: 民族研究所, 1995), 25。
- 12 Henri Lefebvre, 〈空間: 社會產物與使用價值〉, 載於《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 夏鑄九、王志弘編譯(台北: 明文書局, 1994), 21。
- 13 Henri Lefebvre, 〈空間: 社會產物與使用價值〉, 載於《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 夏鑄九、王志弘編譯(台北: 明文書局, 1994), 24。
- 14 Henri Lefebvre, 〈空間: 社會產物與使用價值〉, 載於《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 夏鑄九、王志弘編譯(台北: 明文書局, 1994), 29。



- 15 此表整理自黃應貴，〈導論——空間、力與社會〉，載於《空間、力與社會》，黃應貴編（台北：民族研究所，1995）。
- 16 黃應貴，〈導論——空間、力與社會〉，載於《空間、力與社會》，黃應貴編（台北：民族研究所，1995），16–17。
- 17 朱偉珏，〈文化視域中的階級和階層——布迪厄的階級理論〉，《社會科學輯刊》第六期（2006），84。
- 18 高宣揚，《布迪厄的社會理論》（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4），137。
- 19 安東尼·吉登斯，《社會的構成——結構化理論大綱》，李康、李猛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206–207。
- 20 汪民安：《身體、空間與後現代性》（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105。
- 21 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關注時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種社會實踐，認為以社會行動的生產和再生產為根基的規則和資源同時也是系統再生產的媒介。參見安東尼·吉登斯，《社會的構成——結構化理論大綱》，李康、李猛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 22 我們之所以引進地理大發現作為分析的理路，主要是設想這個時期的世界各國之間的關係前所未有的緊密相連，整個地球空間逐漸地顯示為被感知的整體。關於地理大發現的稱謂和歷史進程和階段，學術界分歧依舊。一般認為地理大發現“便是指15世紀中後葉至17世紀末葉，在各種原因的推動和各種因素的作用下，歐洲人大規模地或揚帆遠航，或長途跋涉，發現了全世界的文明民族均前所未知的大片陸地和水域，對這些陸地和水域乃至地球本身有了初步的了解和一定的認識，開闢了若幹前所未有、前所未知的重要航路和通道，把地球上的個大洲（南極洲除外）、各大洋、各地區直接地緊密地聯繫起來，極大地充實和初步完善了反映地球表面基本地理概貌的地圖冊和地球儀。”參見張箭，《地理大發現研究》（15–17世紀），（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12–13。關於地理大發現的原因，可以歸納地說“地理大發現是雙重力量推動的結果，這雙重力量導源於雙重追求，即資本主義的追求與封建主義的追求及其結合。所謂資本主義追求，主要指商人或資本家對擴大海外貿易、獲取或掠奪海外原材料的追求；所謂封建主義追求，這裏主要指封建國王對領土、貴族及封建社會裏農民對土地的追求。”參見王加豐，《擴張體制與世界市場的開闢——地理大發現新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91–92。
- 23 馮雷，《理解空間——現代空間觀念的批判與重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7。
- 24 戴維·哈維，《後現代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閻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325。



- 25 劉宗緒（主編），《世界近代史》（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488。
- 26 戴維·哈維，《後現代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閻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3），191。
- 27 艾倫·史考特，〈社會的空間基礎之論述的意義和社會根源〉，載於《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夏鑄九、王志弘編譯（台北：明文書局，1994），3。
- 28 艾倫·史考特，〈社會的空間基礎之論述的意義和社會根源〉，載於《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夏鑄九、王志弘編譯（台北：明文書局，1994），3。
- 29 馮雷，《理解空間——現代空間觀念的批判與重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15。
- 30 約翰·奧尼爾，《身體形態——現代社會的五種身體》，張旭春譯（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1。
- 31 理查德·桑內特，《肉體與石頭：西方文明中的身體和城市》（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 32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 — Smith (Oxford: Blackwell Ltd., 1991), 405.
- 33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 — Smith (Oxford: Blackwell Ltd., 1991), 181.
- 34 戴維·哈維，《後現代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閻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3），255。
- 35 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九、王志弘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432。
- 36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8。
- 37 戴維·哈維把“存在”和“形成”之間的對立，尤其是他們在政治條件方面的對立必須看作是時間意義與空間焦點之間的一種緊張關係。
- 38 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九、王志弘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432。
- 39 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九、王志弘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432。
- 40 戴維·哈維，《後現代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閻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367。
- 41 張政文，《西方審美現代性的確立與轉向》（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08），100。



- 42 傅守祥，《審美化生存——消費時代大眾文化的審美想象與哲學批判》（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年），126。
- 43 齊美爾，《社會是如何可能的：齊美爾社會學文選》，林榮遠編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308。
- 44 皮羅，《海德格爾和關於有限性思想》，陳修齋譯，載於海德格爾等：《海德格爾與有限性思想》，孫周興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79。
- 45 Edward W. Soja,《後大都市：城市和區域的批判性研究》，李鈞等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124-125。
- 46 方文，《社會行動者》（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178。
- 47 安東尼·吉登斯，《社會的構成——結構化理論大綱》，李康、李猛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197。
- 48 寬泛而言，恩格斯所表達的歷史合力的觀點，即歷史的發展是有許多人的合力而構成的，但人們的目的之間是相互妥協的結果，從而推動歷史的發展。妥協是在更廣闊範圍內實現意志的聯合和行動的相互融合，妥協是有限性的內核。
- 49 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後果》，田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39。
- 50 Michael J. Dear,《後現代都市狀況》，李小科等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8。

